

簡論艾約瑟對《周易》的 考證和對占卜的辯證批判

■ 呂飛躍

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

艾約瑟(Joseph Edkins)從1848年來華至1905年去世,前後共50餘年,在華期間展開了對中國儒釋道三教文明的研究。由於當時西方宗教學界比較盛行比較宗教學的研究方法,艾約瑟將之與基督教神學進行結合,創立了自己的研究體系。比較宗教學的創始人麥克斯·繆勒(Max Muller, 1823-1900)認為人類宗教的進化歷程可以分為從原始一神到多神再到絕對一神三個階段。基於此,艾約瑟則將之與基督教神學的敘事邏輯進行結合,認為繆勒所言的原始一神就是猶太教的獨一神,且認為這是人類早期文明所共有的現象,而中國上古文明所記錄的昊天上帝就是原始一神的痕跡。^[1]艾約瑟的研究邏輯不僅暗合著西方宗教學界的學術動態,而且與中國乾嘉樸學追溯中國遠古文明進行考據並批判宋明理學的學術風格共相成趣,更為重要的是因此能夠聯合中國士人以製

造文化上的親和力,為傳教服務。

艾約瑟對《周易》考證延續著乾嘉樸學的基本

思路,還原《周易》在歷史、地理、天文及義理等方面的記載,而對其術數成分則進行了辯證批判。

《周易》被稱為儒教「六經之首」,包括《易經》和《易傳》兩個部分。《易經》的內容為六十四卦、卦辭和爻辭,相傳文王拘於羑里而演《周易》,其子周公旦則被認為是爻辭的作者。《易傳》則被認為是由孔子所作,共有《彖傳》(上下兩篇)、《象傳》(上下兩篇)、《繫辭傳》(上下兩篇)、《序卦傳》、《說卦傳》、《文言》和《雜卦傳》十篇,故被稱為《十翼》。《周易》的作者,根據《漢書·藝文志》「人更三聖」認為是伏羲氏畫八卦、文王演為六十四卦,並作爻辭和卦辭,孔子則是作《易傳》來

解釋之。東漢時期,經師認為周公著作了爻辭,到宋代更是提出了「人更四聖」的說法,但這些觀點

摘要:艾約瑟是晚清時期來華的英國傳教士,一生致力於儒釋道三教的研究。來華後,為爭取中國士人的支持以便於傳教,採取了聯儒批佛批道的傳教策略。具體而言,他結合基督教神學和比較宗教學的研究方法,認為上古儒教道德純粹、絕少神秘主義、且崇拜昊天上帝,與猶太教一樣,均是比較宗教學所認定的原始一神,以此肯定聯合儒教。《周易》作為儒教六經之首,艾約瑟自然極端關注,他沿用乾嘉樸學的考證方法探析了《周易》一書的起源,並在此基礎上認為考證了先天八卦的源流發展,否認是邵雍的獨創。

《周易》本為卜筮之書,出於聯合儒教的考慮,艾約瑟則將占卜分為與《周易》相關和不相關的占卜兩類,肯定與之相關的成分,認為這多少窺測了原始一神啟示的奧秘,而對與《周易》不相關的占卜則進行了無情的批判。艾約瑟對《周易》的研究不僅在西方漢學界有一定的影響,且對晚清民國時期乃至今日的中國學者也有一定的啟發。

關鍵詞:艾約瑟;周易;先天八卦;占卜

在「五四運動」後皆被否定，雖然現在的多數學者認為《周易》的確成書於西周初期，但僅僅將之歸之於文王、周公所作未免過於簡單。^[2]

《周易》的內容十分廣博，涉及到中國上古時代天文地理、政治軍事等歷史事件、道德勸化、民風生活等諸多方面的內容，古人通過「觀物取象」和「象以盡意」的手法，對這些內容進行編輯整理，設卦繫辭，^[3]並增加其象徵意義，進行比附，擴大卦辭、爻辭的原始內涵，進而將之用於占卜。由於《周易》後來在儒教、道教中均居於重要地位，被廣泛使用於哲學、宗教、經濟、政治、軍事、武術、算術、文學等領域，與《黃帝內經》和《山海經》一起被稱為「上古三大奇書」，因此艾約瑟自然對之極為關注，先後用中英文發表文章多篇，對《周易》的成書歷史進行考證，並對與之相關的占卜進行了辯證批判。

一、《易經》成書考和作者考

艾約瑟在延續乾嘉樸學考證的同時，一定程度上也開啟了五四運動《易經》考據的先聲。他認為《周易》並不是一本很神秘的書籍，它保留了從上古直到周代真實的古老文化的遺跡，就其內容而言，有類似於《詩經》的內容。^[4]前文已言，《周易》的作者在歷史上多有爭議，艾約瑟根據《周易》成書前已經有《連山易》、《歸藏易》的事實，否認《周易》為文王、周公所作，將之成書看成是一系列歷史文獻匯聚的結果。文王、周公只是對卦辭、爻辭進行了進一步的整理或評論工作。^[5]而在孔子出生之前已經成書的《左傳》更是記載了《易經》被應用於占卜的史實，這表明的《易經》已經存在且被應用，因此，孔子為《易傳》作者也被艾約瑟懷疑。總之，艾約瑟認為《周易》的內容有成書於文王之前，也有成書於文王之後，而有些諸如先天八卦、後天八卦的問題則是宋儒的偽造。

首先，艾約瑟先從歷史考據的角度分析《周易》自伏羲之時已經出現，後來受到了《連山易》和《歸藏易》影響，這可以用以下四個方面以為說明：

第一，就《周易》從伏羲而來的問題，艾約瑟用別卦中的離卦以為說明。由於在甲骨文中離的

本義就是用網捕鳥，且楊雄在《方言》中解釋離有「羅（網羅）」之意，^[6]且別卦離卦源自八經卦離卦。由於主客卦均為一個陰爻居中，兩個陽爻分居上下，艾約瑟將這些和伏羲結網教民狩獵、結繩記事進行聯繫，認為這可能是離卦最初的源頭。^[7]

第二，艾約瑟根據毛奇齡^[8]《仲氏易》的考證，說《周易》以乾卦為首，《連山易》以艮卦為首，而《歸藏易》則是坤卦，且商朝時《歸藏易》又名《坤乾》，這是因為夏商周三代在曆法上的變化所致，因為夏代正月建寅、商代建丑，而周朝則建子，正因此導致六十四卦卦辭、爻辭的混亂。

第三，據記載，《連山易》八萬言，《歸藏易》四千三百言，且毛奇齡認為在《左傳》和《國語》經常使用《歸藏易》進行占卜，也可以說《周易》出現之前，《歸藏易》還沒有丟失且被人使用，而且《歸藏易》為官方藏書，說文王不知此書卻獨闢蹊徑自創《周易》殊不可能，因此朱熹說文王之前沒有《易》的文本存在是錯誤的。^[9]甚至可以說，《連山易》和《歸藏易》為《周易》的編纂提供了必要的規則和先例。

第四，艾約瑟說在周朝文王用「六」、「九」來表示陰陽爻，但在夏商時期，占卜可能是用「七」和「八」來表示陰陽爻，「七」表示了完美的統一體，而「八」則表示了完美的二元論概念。而《周易》六十四卦的每一卦都一個卦爻，可以推測夏商的卦爻也必然有六個。只是《周易》六十四卦中每一卦的陰陽性用「六」、「九」來表示，而《連山》、《歸藏》則用「七」、「八」表示罷了，這一點通過司馬遷的《史記》和楊雄的《太玄經》得知。^[10]因為楊雄的《太玄經》是以天、地、人三方為基礎推演，與《周易》採取二進制，以乾坤二卦綜合全卦、每個別卦只有六爻不同，《太玄經》採取三進制、每一個別卦有九個爻的模式，且這九個爻分別以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上九命名，有可能就是艾約瑟說的《連山》《歸藏》二易用「七」、「八」系爻辭的遺留，因此艾約瑟推論有一定的依據。

其次，艾約瑟從爻辭內容的角度進行了討論，因為爻辭不僅是一系列歷史文獻匯聚的結果，而且還可以發現晚於文王生平的歷史記載。艾約瑟

以「高宗伐鬼方」和「箕子之明夷」兩件史實以為說明。「高宗伐鬼方」記載在第六十三卦既濟卦第三爻中，該爻辭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艾約瑟羅列了許多鬼方的資料，他根據毛奇齡的考證說「鬼方即今西藏地，與西戎相毗連，」同時，根據李善^[1]《文選》注引「鬼方於漢，則先零羌也，在今涼州」，遂認為二人說法差不多；但「《九經古義》^[2]云：『商時鬼方，周時荆楚之地』，《汲郡古文》^[3]『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羌來賓』，則鬼方非專在荆楚，亦非專在戎」^[4]，則不儘然如此。艾約瑟說雖然這些歷史記載十分混亂，但對「高宗伐鬼方」這一史實發生在商朝卻無疑問，因此，這一卦的歷史內容可能取自於商代的《歸藏易》。^[5]艾約瑟的觀點的確符合後來的歷史考證，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確認，商王高宗武丁在位時間約為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根據《汲郡古文》可知此事或發生在公元前1217年左右，距文王出生尚有半個世紀之遙。而對於晚於文王才出現的卦，艾約瑟說明夷卦最為明顯，因為該卦透露出了武王以後的信息。尤其是明夷卦第五爻「箕子之明夷，利貞」，箕子為紂王之叔，因直諫紂王獲罪，故而說「箕子之明夷，利貞」。商亡後，周武王曾問政箕子，是為《尚書·洪範》的由來，後被周武王封於朝鮮，此即箕子朝鮮。艾約瑟根據箕子在紂王時期的遭遇和受封統治朝鮮的歷史事實，及爻辭「利貞」的角度判斷明夷卦是武王滅商後人們根據箕子的遭遇編輯而成，因若早於此則不會有「利貞」的判斷。^[6]

最後，再來討論艾約瑟從卦辭具體用詞上分析《周易》的起源。在《易經》中，與爻辭、繫辭、彖傳等內容相比，卦辭當是最古老的。艾約瑟通過對卦辭的分類，認為卦辭主要涉及到兵刑、婚姻的吉凶等問題，而這幾個方面所透露的事件絕不是一件兩件那麼少，窮文王一生之經歷，也不可能經歷這麼多，因此，他就在這幾個方面重點討論之。

第一，他觀察到卦辭中「有言元者、有言亨者、有言利貞者，乾六陽之卦，元亨利貞四者俱全，然其他各卦言元亨利貞者亦不一而足」的情況，推測說：「此四字，非必文王所創設，必要有商

以來世俗流傳有此四字，文王取而用之，蓋商時本自有易，所謂《商易》者，此也」。因此如果說「文王之易謂之勝於《商易》者則可，謂之不根於《商易》，恐不然也。」另，艾約瑟說坤卦卦辭「有『利攸往』之言，其言似出門一事之意；亦有『有孚』之意，有孚者，言其可為依賴也；若『利涉大川』似即相傳之舊說，其先必為卜人筮人所假托，他如『利見大人』卜人筮人之所相為假托者，始意要亦如是。」而且還有「言乎吉者，言乎凶者，言乎無咎者」，其實這些言語其實都是商朝「卜人筮人襲用之成說，文王本卜人筮人之成說而引申之，以推衍為一家之書。」

第二，對《周易》中的「利」字進行討論，他說「用『利』為一句領起者，如『利建侯』，其言建也，似新封諸侯矣，然不僅封新諸侯也，大抵王者心有不定命，諸侯即來助之，抑或下令諸侯即來助之，似乎借此以為決斷之地也。」而「凡言利用獄女貞、利用行師、利堅貞云云，皆可即此求其故矣。」另一方面，就《易經》中出現的「不利者，如不利即戎，大約言其不可急遽以戰，須臨事而懼遲會回審，顧見其可而後進庶乎」等等之類的話「為《易》中常用之字，可謂之為卜人筮人所習用之字無所不可，而謂為文王之所創用轉覺有所不可。」這一方面多涉及政治軍事之類的言語判斷。

第三，艾約瑟從復卦卦辭：「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中「七日來復」進行討論。艾約瑟說這其實是「卜人筮人喜習乎大祭，必變乎以持齋，而持齋之節每以七日為限，一月之中恒以七日守乎持齋潔淨之規，則事得其吉」。然而「大抵古時西方風俗與華相同，愈古則猶覺相似，而其由來，必由占者之自西徂東相為傳述、中人輾轉，稱道非出於《夏易》即出於《商易》，非出於《商易》即出於《夏易》，文王從而用之，又別成《周易》。其實前無所因，後人何能由此創設？」^[7]可見，艾約瑟將「七日來復」這句話和西方的七日一周的概念相互聯繫起來，在其英文文章中更是直接點明它和既濟卦中的「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的觀念類似，均起源於巴比倫，在猶太人的安息日中依舊得到保留。^[8]如此，艾約瑟不僅說明了《周易》起源於《商易》或《夏易》的問



題，更為其「中學西源說」尋找依據。

二、《易傳》考證

艾約瑟除了對《周易》的卦辭和爻辭進行考證外，也對《易傳》進行了考證。《易傳》成書的具體年代至今未定，作者相傳為孔子，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第一次提出這樣的觀點，並影響至深。宋代歐陽修首先懷疑《繫辭》為孔子所作，清朝崔述^[19]對《彖傳》、《象傳》為孔子所作也表示懷疑。到近現代特別是五四運動以後，大多數學者均認為《易傳》非孔子所作，實為戰國時期陸續成書。^[20]艾約瑟來華時，正處於中國對《易傳》進行考證由古代向現代轉化邁進的關鍵階段，其對《易傳》的考證自然也扮演著關鍵的一環，通過考證，艾約瑟不僅使其「中學西源說」見諸筆端，且因此推導出對宋儒先天八卦的批判。

在《論彖傳象傳》一文中，艾約瑟說在以往的歷史研究中，有認為《十翼》「俱出於孔子」，但是艾約瑟根據自己的觀察說這些資料都是長期的歷史匯編而成，而非一人一時可以成功。艾約瑟大致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論證：

第一，艾約瑟說《彖傳》並非孔子所作，因為該問雖「大抵作者即六十四卦之中一一釋其卦名卦義，以見易理之所包者至深且遠，而復真實可恃。雖經孔子之訂正，而亦不皆為孔子所自作，故門人弟子不加『子曰』以別之。」意即孔子只是《彖傳》的訂正者，而區分的標準則在有無「子曰」二字，由於這一情況在《繫辭傳》同樣出現，艾約瑟說「有『子曰』二字似本孔子所作，故門人子弟加『子曰』於上，以明悉其為師說；其無『子曰』字者，則似未必孔子之說」。^[21]

第二，艾約瑟說古人觀象設卦，包羅萬象，《彖傳》作者列舉事物駁雜繁多，與《易》已言，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如屯卦《彖》曰：「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艾約瑟說「作《彖傳》者，一己既知其理，意欲人人共明其理，以出乎險也。」又如同人卦為「教人人心貞固以燭乎機先，而愚者可牖而明。此心既明，而事無不舉也。」再比如謙卦為「有謙卑者自牧之，而『謙受益、滿招損』其言實見於《夏書》，則《彖傳》所云『天道虧盈而

以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諸辭實即書言而為之暢言其旨也」等等，總之《彖傳》就是「舉世間之事以為比附，而人與人往來酬酢亦必議擬及之。」而面對如此多的事情，與《周易》非文王一人獨自完成一樣，則可知《彖傳》「非一時一人只所為，其來為已久也。」

第三，孔子言論與《周易》不甚一致，細察之且「與文王、周公之意旨有不同。」艾約瑟根據《彖傳》文意推測其作者必然「深知五行之蘊，因其所發明只在乎剛柔、明晦、男女，大抵用心於五行之人故能講求推闡在此也。」但孔子則不然，因為儒學「微言大義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餘緒，不及乎剛柔、明晦、男女；而《彖》與孔子平日之言不同」，更為重要的是「孔子不甚喜言五行」，如果以《論語》為參考的話，可知孔子「所喜者三綱五常」，此為又一證據。

第三，就有人認為《彖傳》為老莊所作的問題，艾約瑟也認為絕無可能。艾約瑟說如果是討論虛無的道理有可能是老莊，而討論陰陽不可能是，且《彖傳》對人的仁義道德方面有要求，與老莊抨擊仁義道德有差別，因為《十翼》中「多及造物之主並人人耳目前所有之事」，所以也不可能是老莊。接下來再來看艾約瑟對於《象傳》考證。對於某些考證認為「《大象》出於周公、《小象》出於孔子」^[22]，艾約瑟則認為是「卜人筮人之舊說，蓋語必有所因，周公孔子正不能鑿空而言也」，而且《象傳》所「衍測頌讚之意初不越善惡邪正、仁義道德、人倫日用，作止語默之常則似非有道之士不能為之敷陳、為之訓示、為之旁通曲暢，以彰往而察來」，這些都表明其「為卜人筮人之舊而復羅舉儒先之說，薈萃成之。」此外，艾約瑟還觀察到《大象》中「喜言先王、喜言後與君子」，與老莊之言大不相同。

在艾約瑟所作《論繫辭傳（上、下）》中，對《繫辭》作者的考證基本與《周易》和《論彖傳象傳》的考證方法相同。在《繫辭傳》中有「《易》與天地准，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又「廣大以配天地，變通以配四時，陰陽以配日月」等言語，艾約瑟認為這是「古人上觀俯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偏閱乎日月星辰、風雲雷雨、五聲五色以發明天地萬

物之理，寒暑陰陽幽冥生死之故」，而這道理在《繫辭傳》中「或有托言伏羲焉者，或有言神農焉者，或有言黃帝焉者，大抵此三聖人俱能深明大易之精蘊，故《詩》、《書》所不言者，而《易》之《繫辭傳》獨言之」。且在《繫辭傳》中討論到關於伏羲「王天下，而中國之法制、典章、器用、財賄一一由此而始，其言簡要親切，初不若列子禦寇^[23]所言伏羲之形半魚半人荒誕悠謬而無可考證，因以知《列子》之書作之者遠出於作《繫辭傳》者之人之後。」^[24]由此可見，艾約瑟將人類從原始一神向多神墮落的理論應用到了對《易經》的考證上，他不僅將儒教視為人類原始一神樸素信仰的保存者，更將神仙鬼怪之類的傳說和儒教撇清關係，並視之為墮落的體現，進而推論雖然《繫辭傳》《列子》均在戰國時期產生，但《繫辭傳》的思維肯定更接近原始一神的上古時代。在《繫辭傳》中，還談論到關於大衍推算問題，艾約瑟認為「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又「天一、地二、天三、地四至天九、地十，凡諸所記載，皆中國算數之學之祖。」且關於大衍的算法，「一、三、五、七、九為天數，二、四、六、八、十為地數，天地分而陰陽即由之而分」，而天數之和為二十五，地數之和為三十，「合之為五十五數，去其五數為五十數用之以占測萬事，謂之大衍，當於其中抽出一蓍為太極，然後分之則兩儀是也，再分為老陽、老陰、少陽、少陰，則四象是也」，又和春夏秋冬四季對應。^[25]艾約瑟說四象對應四季的理論最早見於戰國時期的著作《素問·靈樞》，西漢時期已經在中國十分流行，可見《繫辭傳》同時也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響而採擇用之，因此其產生於戰國時期無疑。

三、先天八卦的流變考據

先天八卦，又稱伏羲八卦，它以乾坤定南北，坎離定東西，與在《說卦傳》中後天八卦離南坎北、震東兌西的布局不甚至一致。宋代以前，並沒有不同的八卦體系，邵雍繼陳搏之後，逐步區分了先天八卦和後天八卦，朱熹在《周易本義》一書中採用邵雍的說法，使其大為流行。對此，艾約瑟沿襲了乾嘉樸學的考據思路，特作《論說卦傳》一文進行考據，其主要目的是否定邵雍創立的先天八

卦理論，視先天八卦為是術數易學發展演變的結果，同時，也起到批判宋明理學的目的。

《說卦傳》本為《易傳》的篇目之一，西漢時期《說卦傳》同時包括《序卦》和《雜卦》，其主旨內容是介紹乾、坤、坎、離、震、巽、艮、兌八經卦所象徵的各種事物，同時對六十四卦的排列原理和各個卦象的屬性進行闡釋，進而輔助占卜，故名《說卦傳》。王充《論衡·正說》有言：「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26]《隋書·經籍志》云：「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27]艾約瑟自然注意到了這一信息，開始了對《說卦傳》的考證。

艾約瑟說在漢朝《說卦傳》被發現後，「京房見之，因以其言作《易傳》，發明曆法，並推闡義理」，且「漢儒易學多從京房，借以《說卦》為本」的現實推動了象數易學的發展。到了宋朝，陳搏和邵雍附會遠古，直接將「先天之學以為是乃伏羲之易」，同時又「創立伏羲八卦方位之圖，謂即易之所自始」。在邵雍的先天八卦中，以「天（乾）居南地，地（坤）居於北，水（坎）居於西，火（離）居於東，風（巽）居西南，山（艮）居西北，澤（兌）居東南，木（震）^[28]居東北。居於南者多陽，居於北者多陰。」很明顯，這與後天八卦的方位不同，艾約瑟對此推測到艮為山居於西北是因為「中國江河之水多東流入海」，且「崑崙山在中國西北，江河之源實在於此」，將火放在東方是因為「東者為日東升之意」。艾約瑟說陳搏、邵雍這樣安排大概是他們比較喜歡京房、楊雄的說法，並且能夠「添出一先天之學」，欲分「伏羲與文王為二」，以達到「自矜其異」的目的。

艾約瑟進一步分析說，歷史的真實的情況卻是邵雍的先天八卦圖「或古所自有，考之殷易首地，夏易首山。知夏殷之易系如是者，《歸藏》、《連山》之名而自知。故毛西河（即毛奇齡）《仲氏易》云：『陳、邵之易有誤』，其言未嘗不得其實也。」同時，艾約瑟說在中國歷史上，「亦有格致之學，在觀《周脾》可知，且周公尤喜算學，而算學者，五行與格致之基也」，且「巴比倫古昔格致家多



言五行，或如佛教言地水火風，而或言四行、或言五行流傳於諸地，遂為中國五行學說之本」。而將五行引入對《易經》八卦的解釋則始自京房，而「漢學喜言八卦、五行相交錯流行於天地之中」，且「五行則有生克，八卦則如棋相關」，到了陳搏、邵雍繼續推闡出先天八卦的理論。因此，先天八卦是在巴比倫因素的影響下，「本於周公之說，特邵氏少變其名目」，溯遠古「上托於伏羲」，到漢朝「出於京房，後則鄭康成^[29]言之，迨宋陳邵言之益詳」，以致於「自漢迄宋，益多傳合並，美其名為『先天之學』云」。^[30]

四、《周易》占卜的定位

《周易》一書本為占卜之書，艾約瑟在考證其作者之時也多次言到為夏商周歷代卜人筮人匯撰的結果。既然為占卜之書，也就必然涉及到對占卜的評價。大體說來，艾約瑟將占卜分成了兩個不同的類別，一類是與《周易》相關的占卜，一類是與《周易》不相關的占卜。

由於艾約瑟對儒教採取聯合的策略，對《周易》占卜也表現出了兼具肯定、否定的雙重評價。他從比較宗教學的基本理路出發，認為在原始一神之後多神論出現之前，有一個二元論階段，由於此階段接近原始一神，沒有太多的神秘主義內涵。^[31]這與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邏輯相類似。

艾約瑟對中國古人占卜所使用的工具也是了如指掌，最早的時候是龜甲，之後是蓍草。進行占卜的時候，卜人則將占卜的內容記錄下來，而《易經》的大部分卦辭、爻辭就是卜人在占卜之後給國家或人們的生活提供指導的記錄。由於人們的占卜必然與真實的歷史事件有直接的關係，因此《周易》也歷史資料的保存者，而通過文王、周公對卦辭、爻辭的整理，可以說《周易》已經建立了全面深徹的理論體系，囊括關於這個世界發展變化相對較為深刻的道理。

此外，《周易》中有很強烈的道德勸善、教化的成分，接受其建議的聖人君子或英雄們能夠獲得知識和智慧、道德的提升和思想境界的升華。如艾約瑟盛讚《周易》「蓋而與《論語》間有符合，

特較之《論語》意蘊更為浩博，有上下經未言而《彖傳》始言之者，後之儒者，學易而有得也。」並認為學習《周易》則「內而片念可幾於安坦，外而百事可浚其靈明。品之卑下者，可進於崇高；詣之瘠薄者，可臻萃美。」且《周易》用「實事以為指示，比人人尤易知而易行，如父兄之詔子弟、師長教生徒，由心而發之於身，由體而達之於用，或指引其人為印證，或備志其事以為法戒。」而這一切「不外於占卜之事引人去其不善以進於善，而易之能事已蔽之於此。則易之為易，一觀乎《彖辭》，一卦如是，六十四卦亦復如是。」^[32]因此，可以說是人類在最早的時候所進行的比較科學的活動。^[33]而艾約瑟否定的地方則明顯有基督教信仰的態度，將之視為對原始一神信仰的背叛。他說，在遠古的時候，人們都和上帝有一種交流的能力，但不是以占卜的方式獲得，乃是上帝以啟示的方式使人們知道，因此占卜其實是一些自認為有先知能力的人企圖窺測上帝的奧秘，是人的墮落的體現。^[34]

在對與《易經》不相關的占卜活動的評價中，艾約瑟則毫不客氣的斥之為無用、荒謬。他說在西方，現在「泰西諸國其富豪之家婦女多有能視人手掌紋而定是人終身之吉凶者，然亦不過藉以嬉戲；而上古希臘人喜炙骨卜，乃炙羊之琵琶骨以決吉凶」，此外還有「占火、占煙、占雲、占水等術」，其「占水之法，則以石子三枚投擲於水中，即水面三圓紋散處交錯而占定之也」，此外還有用杯水占卜法、字母奇偶數占卜法、動物占卜法、占字法、銅錢占卜法、占星術等等，艾約瑟說這些「占卜之術，究無足憑，長詐長奸勢所不免。今中西諸國以此愚者多，而以此愚人之事之語尤多也。」^[35]

五、結論

通過艾約瑟對《周易》的考證，我們可以發現艾約瑟的研究兼具中西方學術發展脈絡的情況。一方面，艾約瑟對中國學術發展的基本脈略十分熟稔，對乾嘉學派的考據之風也十分了解，在徵引乾嘉學派基本學術觀點的同時，更進一步利用其對上古中國文明的追溯考據和對宋明理學的批判，恰如其分的為自己比較宗教學的研究進路服務。另一方面，則運用西方宗教學界比較宗教學的

基本研究方法，視中國上古時代為最接近原始一神啟示的時代，之後的多神論和神秘主義大興則是導致中國文明逐步走向墮落，與乾嘉樸學對宋明理學的批判基本一致，從而構建起對《周易》研究的基本理路，也在此表明了他聯合儒家批判佛道教的基本傳教策略。在此基礎上，艾約瑟對《周易》的考證不僅基本上沿襲了乾嘉學派的學術意趣，更是在晚清民國時期乃至今日對《周易》研究史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一環。就占卜而言，艾約瑟的評價明顯偏頗，自然這與其試圖接好中國士人以便於傳教的目的相關。因此，可以說，在艾約瑟力圖做到中西協同、古今兼具的考證中，也恰恰將這樣思考的一些瑕疵表露無疑。

[1] 見聖經《舊約·創世記》第6-8章。

[2]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一卷）（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年），第8頁。

[3] 郭彧譯注：《周易·王樹人序》（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1頁。

[4] Joseph Edkins: The Yi King of the Chinese, as a Book of Divination and Philosophy.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ew Series*, Vol. 16, No. 3, Jul 1884, p.363. 艾約瑟認為《周易》和《詩經》相同的文風問題在朱伯崑的《易學哲學史》（第一卷）中也有類似的論證。

[5] Joseph Edkins: The Yi King of the Chinese, as a Book of Divination and Philosophy.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ew Series*, Vol. 16, No. 3, Jul 1884, p.360.

[6] 艾約瑟所處的時代，甲骨文尚沒有發現，他也沒有明確說明是參考了楊雄的《方言》一書來解釋離字，但在其文章中則將「離」釋為「網羅」，見Joseph Edkins: The Yi King and Its Appendices, *The China Review*, Vol 14, No.6, 1886, p.318.

[7] Joseph Edkins: The Yi King of the Chinese, as a Book of Divination and Philosophy.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ew Series*, Vol. 16, No. 3, Jul 1884, p.370.

[8] 毛奇齡（1623-1716年），字大可，號西河，浙江蕭山人，明末清初經學家、文學家。毛奇齡所著的《仲氏易》一書論到宋人的《易經》講錯了，且認為周敦頤的《太極圖說》是來自道教的文獻，極為符合艾約瑟對宋朝關於先天八卦的批

判，所以艾約瑟多處採用毛奇齡的觀點，以為奧援。

[9] 《周禮·春官·宗伯·大卜》中言：（大卜）掌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其《筮人》又云：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參見孫怡讓撰：《周禮正義》，王文錦、陳玉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928、1964頁。

[10] Joseph Edkins: The Yi King, with Notes on the 64 Kwa, *The China Review*, Vol 12, No. 2, 1883, pp.79-80.

[11] 李善（630-689年），廣陵江都（今江蘇揚州）人，高宗時期著名學者，書法家李邕之父，著有《文選》十卷，流行於世。

[12] 《九經古義》，清惠棟（1697-1758年）著，此書所注解的經典《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和《論語》，共十部儒教經典，故名。

[13] 《汲郡古文》，又稱《汲郡周書》《逸周書》，該書共10卷70篇正文，還有11篇有目無文，主要記錄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穆王、厲王和景王時期的歷史事件。有人認為是晉武帝咸寧五年（279年）發掘自汲郡，故名。但由於《漢書·藝文志》已經提到《逸周書》，故現代學者推斷《逸周書》是由晉人將漢代流傳的《逸周書》和汲郡發掘的《汲郡古文》合編而成。

[14] 艾約瑟：〈論爻辭〉，載《萬國公報》1891年10月，第5頁。

[15] Joseph Edkins: The Yi King, with Notes on the 64 Kwa, *The China Review*, Vol 12, No 2, 1883, pp.77-78.

[16] Joseph Edkins: The Yi King, with Notes on the 64 Kwa, (Continued from Vol 12), *The China Review*, Vol 12, No 5, 1884, p.413.

[17] 艾約瑟：《論卦辭》，載《萬國公報》1891年8月，第3-6頁。

[18] Joseph Edkins: The Yi King and Its Appendices, *The China Review*, Vol 14, No 6, 1886, pp.303-322.

[19] 崔述（1740年-1816年），字武承，號東壁，直隸大名府魏縣（今河北魏縣）人，清代著名學者。主要貢獻在疑古辨偽方面，主要著述有《考古提要》、《夏考信錄》、《商考信錄》、《豐



編考信錄》等，共計88卷，由其門人陳履和整理匯科為《崔東壁先生遺書》。

[20] 同注[2]，第42頁。

[21] 艾約瑟：〈論繫辭傳下〉，載《萬國公報》，1892年1月，第12頁。

[22] 《象傳》分為《大象傳》和《小象傳》，《大象傳》共有64條，分別對《周易》64卦的卦辭作出解釋，並闡發其倫理意義；《小象傳》共有386條，對應64卦的386爻辭（原本384爻，外加用九、用六二爻，計386爻爻辭），重點說明爻辭意義。原本單獨成章，今日通行本《周易》則常見分列於各卦辭爻辭後。

[23] 列子禦寇，即列禦寇（公元前450~前375年），人稱列子，春秋時期鄭國人，道家學派的先驅性人物，主張「貴虛」。列子事跡在《史記》中無載，其名散見於《莊子》、《管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書，相傳其著作為《列子》，又名《沖虛經》，主旨內容為宣傳無為、順從自然，達到無用之用的境界，《列子》一書還包括諸多寓言故事，如杞人憂天、歧路亡羊、愚公移山等。

[24] 艾約瑟：〈論繫辭傳上〉，載《萬國公報》，1891年12月，第7-8頁。

[25] 同上，第9頁。

[26] 王充：《論衡·正說第八十一》，參見網址<https://zh.m.wikisource.org/wiki/%E8%AB%96%E8%A1%A1/81>，瀏覽日期2020年10月13日。

[27] （唐）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12頁。

[28] 為便於理解和下文敘述，括號內內容為作者自加。

[29] 鄭康成，即鄭玄（127-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東高密人），東漢末年儒家學者，經學大師，曾入太學攻讀《京氏易》、《九章算術》、《公羊春秋》等，又從張恭祖學《古文尚書》、《左傳》、《周禮》等，最後師從馬融學習古文經。著有《天文七政論》、《中侯》等書，百萬餘言，為漢代經學的集大成者。

[30] 艾約瑟：〈論說卦傳〉，載《萬國公報》，1891年8月，第8-10頁。

[31] Joseph Edkins: *The Early Spread of Religious Ideas, Especially in The Far East*,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893, p.23, 61, 71.

[32] 艾約瑟：〈論象傳象傳〉，載《萬國公報》，1891年11月，第13、14頁。

[33] Joseph Edkins: *The Yi King and Its Appendices*, *The China Review*, Vol 14, No. 6, 1886, pp.361-318.

[34] Joseph Edkins: *The Early Spread of Religious Ideas, Especially in The Far East*,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893, pp.102-103.

[35] 艾約瑟：〈占卜無憑論〉，載《中西交會新報》，1891年5月，第4、5頁。

A Brief Discussion about Joseph Edkins Textual Research on Yiking and Dialectical Critique of Divination

Lu Feiyu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Joseph Edkins was a British missionary who came to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e devoted his life to studying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adopting a missionary strategy of combining Confucianism, criticizing Buddhism and Taoism for evangelization. He combined Christian theology and comparative religion for researching and believed that the ancient Confucianism was morally pure, no mysticism, and worshiped God Haotian which is like Judaism. Joseph Edkins was naturally concerned about the Yiking for it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canon in Confucianism. He followed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extology in Qing Dynasty to analyze the origin of Yiking and believed that he found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nate Gossip while denying created by Shaoyong. Yiking was originally a book of divination which was divided by Edkins into two parts: those related Yiking and those unrelated for uniting with Confucianism. Joseph's research on Yiking had influence on both Western Sinologists and Chinese later scholars.

Key Words: Joseph Edkins, Yiking, the Innate Gossip, Divination